

文化遺產、懷舊意識與城市文化形象

遺產元素在博物館平面設計應用的思考

吳衛鳴* 陳炳輝**



由耶穌會興建於 17 世紀初的澳門聖保祿教堂前壁遺址

在全球化環境下，為了在鄰近地區中突顯自身的優勢位置，各地紛紛為自身尋找獨有的文化論述，發掘過去的歷史文化遺產。文化遺產作為存在於一地的歷史見證，是當代社會尋求發展的一種重要資源，透過它去喚起關於某地昔日時空的相關記

憶和情感，並將它提昇成為象徵某地文化形象的外部特徵，以及城市文化內在意涵的組成部分。

今日澳門以旅遊娛樂事業為經濟的一大支柱，透過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去建構一個具地方文化特色的社會環境，是與鄰近地區及在國際範圍保持競

*吳衛鳴，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 **陳炳輝，澳門藝術博物館館員。

爭、並持續發展本地經濟特色的最佳手段。而澳門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推廣，正是要喚起本地市民關注那些使他們有別於其它的文化特色，同時亦使外地遊客藉此發現澳門存在的獨特歷史文化。

在澳門回歸祖國後踏入新紀元的今天，澳門的文化遺產可作為本地尋求發展的文化論述基礎，能喚起及建構人們對澳門城市的文化想象。為此，澳門藝術博物館在展示設計上透過對文化遺產元素的再利用，企盼協助澳門城市文化形象的生成，並以視覺圖象激發起市民的懷舊情感，重新組合我們的歷史記憶，賦予文化遺產新的時代意義。

全球化與多維的文化遺產概念

人類在生存環境中的豐富生活經驗與文化累積，當中包含了社會行為、儀式、審美觀、價值觀、象徵物等等承傳於人與人之間的特殊文化現象，這些文化累積往往構成了不同時空中某個民族或社群的性格與特質。一個族群的性格、文化意識和歷史記憶常常會投射到物質文化層面上。因此，無形的文化遺產是在地方歷史脈絡下形成的文化傳統，是精神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總和；而有形的文化遺產，則是地方文化精神投射於具體物質上的歷史見證。它們共同反映着不同地方的人們如何適應自然環境及其持續發展的道路，是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智慧結晶。因此，不同地區的文化遺產，理應沒有孰優孰劣之分。世界各地都應對自身的文化遺產進行保護。

一個地區的文化遺產是在歷史過程中漸漸地遺留下來，同時也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被繼承，但更多的則漸漸消失。由於自過去的“歷史”到“現在”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故文化遺產本來就存在於你我四周，與我們的生活緊緊結合在一起。它常常有意無意地被呈現、喚起，或被遺忘於我們的生活角落。

然而，隨着全球化的發展，物質與資訊的快速流動，逐漸地抹掉了不同社會間的歷史差異，使得世界各地已不可能再有單一純正的地方文化存在。地方文

化群體被迫去適應世界主流文化，而消費文化與種種後現代社會現象充塞在日常生活中，使得認同的意識難以凝聚，一切身份認同已不再堅實穩固。在這歷歷在目的洪流之中，地方的文化遺產正不斷地遭受來自四面八方的衝擊和威脅，如何對文化遺產進行保存和維護，成為各地文化工作的當務之急。

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文化遺產”從人們生活的空氣中被客體化下來，當它被概念化而成為法律條文和公約以後，不同地區的人們逐漸地跟隨着主流意識，提昇對自身文化遺產的關注和保護。至今有關它的概念，像山洪暴發般地擴展延伸，從物理性的實體區分出可移動的和不可移動的遺產，從單體的文化遺產擴展至群體的、甚至與自然環境之間相互聯繫的遺產群，從可視的、物質性的擴展至非可視的、非物質性的遺產，等等。

一個多維的文化遺產概念正漸漸地形成以及在不斷完善當中，而這廣闊的定義，將隨着全球化趨勢席捲各地，在各自的歷史境遇中生根，形成特有的詮釋觀點，並左右着各地文化遺產保存工作的方向及其內涵。一些學者認為，在經濟全球化之下，各地文化會完全漸趨一致化的這個觀點，可能是經不起考驗的，因為即使是世界工業強國的文化商品大舉壓境，與在地社群的文化行為部分趨同，但身處於不同生存環境中的各地人群，亦以其各自的特殊方式去適應全球化，並且營建出有別於他者的差異性。我們不能低估處在多元文化相斥或相容的背景，個人、團體或社群的適應、創新及想象的能力。

懷舊意識與文化遺產保護

澳門的歷史文物建築群，於2005年7月15日正式申報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並重新命名為“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有關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開端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當鄰近地區對文物建築仍未有應有的保護措施之時，當時的澳葡政府已於1982年成立“澳門都市風景暨文化財產委員會”，為澳門的文物建築造列



在巴羅克式的聖保祿教堂前壁中出現中文字樣顯示了早期多元文化的交融

清單。1984年，由前述不具法律效力的委員會，確立成為具法律效力的“保護建築、景色及文化財產委員會”，對澳門的紀念物、樓宇、組合體與建築文化財產作出清晰的甄別。⁽¹⁾到了1980年代末，委員會陞格為政府部門，隸屬於當時的澳門文化司署（今澳門文化局的前身）。自1999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以後，相關部門隨即改組成為文化局之文化財產廳，近年一直致力將澳門文物建築群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以及申報成功後的持續維護工作。

文化遺產的保護運動在澳門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一種“懷舊之情”伴隨着這個運動的起始而展開，漸漸地瀰漫於整個澳門城區的空氣之中。“懷舊”（Nostalgia）這個詞，最早由人類學家羅撒爾多（Renato Rosaldo）提出，原先是用以描述殖民者對被他們在殖民過程中所破壞的“本土”（native）文化的一種眷戀之情。⁽²⁾克萊頓（Cathryn Hope Clayton）則用它來描述殖民者希望重溫昔日殖民時代的財富、權力和特權的慾望，而這些美好日子，

看來已一去不復返了。⁽³⁾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與“懷舊”有着密切的關係。一位曾參與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遺產保護工作的建築師就曾說過，文化遺產保護的倡導是因為“懷舊之情”而開始的。⁽⁴⁾

雖然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自70年代末已在澳門起步，但是在1987年中葡簽署聯合聲明、澳門進入後過渡期以後，整個遺產保護工作才有較具體的進展。這些進展包括投入更多的資源，每年動輒花費數百萬元進行建築文物的修復工作。澳門回歸以後，特區政府亦不斷地壯大其文物保護隊伍⁽⁵⁾，使得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工作終於達至成功。

由於懷舊的情緒與遺產保護運動的起始直接相關，故自澳葡政府時代過渡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期間乃至今日，它的力度依然絲毫未減，持續不斷地投射於澳門的文物保護工作之中。不過，今日與喚起懷舊情緒有關的文物保護工作，已經隨着回歸後歷史新紀元的到來而賦有嶄新的意義，其背後的動機和內涵都與回歸之前截然不同了。

文化論述與城市形象

今日澳門進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對懷舊情緒的喚起，與澳葡政府最初進行遺產保護工作的初衷已完全不同了。在今天以旅遊娛樂事業為經濟支柱的澳門，透過文物保護工作去建構一個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環境，是與鄰近地區及在國際範圍保持競爭、持續發展本地經濟的最佳手段。而澳門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推廣，正是有想喚起本地市民去注意那些使自己有別於他者的文化特色、同時亦使外地遊客去發現澳門存在着獨特的歷史文化的意圖。⁽⁶⁾

處在全球化形勢下的各地群體，紛紛為自身尋找文化論述的基礎（search for fundamentals），因為在世界經濟貿易與文化物品廣泛流通的當今社會裡，地方特有的“差異性”，往往成為市場上競爭優勢位置的手段。⁽⁷⁾“傳統”和“文化遺產”現已被用作為增加某地的吸引力、吸引外來者投資和旅遊的重要元素，從而提昇本土的生活質量。在這個生存競爭的環境中，透過地方上的“文化遺產”建構出別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顯然是各地藉以突圍而出的好方法。於是，一套套述說着自身文化特色的論述到處湧現。一些原本藉藉無聞的地方，一下子躍昇成為文化地圖上的新據點，一個處處充滿“地方文化特色”的全球性旅遊觀光事業正興旺地發展。

而在過渡期的澳門歷史境況中，由於葡國殖民時代結束前後的政策影響，以及澳葡政府的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進程，澳門本地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漸漸出現了一套嶄新的歷史文化論述。1979年，中葡兩國簽署協定，宣佈澳門已不再處於殖民地的政治地位，而是一個“在葡國管治下的中國領土”⁽⁸⁾。此後的二十年間，澳葡政府除了與以

往一樣在政治和法律領域方面付出極大努力外，同時在歷史、文化、藝術領域方面亦投放了大量的資源和努力。一時間，整個澳門的城市形象，迅速地由一個“在東方的歐洲城市”轉變成一個“東西方交匯的城市”，其特徵是多元文化的開放、寬容、混雜、交匯和交流，而不是葡人的統治、排外或殖民。⁽⁹⁾

這種歷史文化論述的轉向，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尤為明顯，大力倡導文化遺產的保護，伴隨着的是一個有意識地述說澳門“去殖民化歷史”的歷史過程。一批持有新觀點的歷史學家重新在澳門的歷史材料中找尋“東西文化交流在澳門”這套論述的證據。⁽¹⁰⁾而混雜有中歐特色的建築文物，正好為澳門作為一個“東西文化交匯點”的說法提供有力的佐證。



興建於1857-1873年的崗頂劇院成為中國境內首座西式劇院

這些文化遺產所呈現的本地文化特色，正好為過渡期間的澳門，以及澳葡政府的去殖民化過程中所需要尋找的一套用於美化過去、發展未來的論述覓得文化基礎。而這套論述，亦漸漸地成為今天澳門的文化學術圈、甚或在旅遊娛樂事業及其它層面在論述澳門特徵時最常出現的語句，並在澳門回歸後賦予了一個作為開創澳門歷史新紀元的城市文化形象。

博物館展示與文化形象建構

將澳門的文化遺產作為本地尋求發展的文化論述基礎，而這套論述及相關的文物保護工作，又喚起一種懷舊情緒，以其建構人們對澳門城市的文化想象，這種解說似乎可以暫時用來描述近年澳門文物保護工作的內涵。

具有文物保護工作性質的博物館及它的展示內容與懷舊情緒（或是感情記憶的投射）的喚起同樣息息相關。自20世紀90年代初迄今的十多年間，在澳門這個彈丸之地就有超過十五間以上的博物館建立起來，一個“博物館熱”正在澳門燃燒。而這些博物館，大部分正以不同的角度述說着澳門不同方面的歷史文化。



俄國畫家史密羅夫筆下20世紀40年代的澳門風光

在眾多的博物館中，有兩間博物館（澳門博物館和澳門藝術博物館），對懷舊意識和集體記憶的喚起以及在建構澳門文化形象的工作上，相對而言較為明顯。正如設計澳門博物館的建築師曾說：“我們將（博物館的展示）焦點集中在老一輩市民仍然記得的一個不復存在的澳門昔日生活面貌中，希望在博物館開幕後能激起觀眾的情感。”^{（11）}

而澳門藝術博物館自1999年3月開幕以來，即以推動藝術教育及通過文化藝術交流以樹立澳門鮮明的文化藝術形象為目標。總結過去七年該館曾舉辦過的展覽，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我們舉辦了不少以澳門本土為主題的展覽，如“澳門歷史繪畫”常設展、“史密羅夫筆下的澳門”水彩畫展、“港澳考古聚珍”文物展、“澳門的回憶空間——艾柏克攝影藝術展”、“澳門當代繪畫展”、“永不回來的風景——澳門昔日生活照片展”、“尋找澳門——李超宏濠江舊影攝影作品展”、“館藏澳門黑沙遺址史前陶器展”和“澳門新潮——當代藝術展”等等。這些展覽，正嘗試透過藝術品去表述澳門的文化事物及歷史風貌，為澳門營造地方文化特色。

同時，藝博館亦舉辦了不少與外國交流合作的展覽活動，如“文明之光——墨西哥古代文物展”、“巨匠心影——畢加索版畫展”、“尼斯新潮——法國當代藝術展”、“澳門國際版畫展”、“藍色幻想——米羅、畢加索藝術作品展”、“蔚藍海岸——法國南部風情海報展”。透過這些展覽，嘗試在對外的文化藝術交流中，憑藉文化對照作用，去辨認和尋找本土文化的獨特性。

而每年亦與內地的博物館合作舉辦大型展覽，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館等等國內重要文博單位。當中尤以名為“盛世風華”、“金相玉質”、“海國波瀾”、“懷抱古今”和“妙諦心傳”等等的清代宮廷文物展覽令人觸目。這些展覽多選擇以能反映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介角色的文物，在展示與詮釋的基本方向上述說澳門擁有中華文化的歷史根源，同時亦宣揚澳門在早年西洋文化、藝術、知識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所處的特殊歷史地位。

近年澳門藝術博物館更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共同合作，舉辦如“至人無法——故宮、上博珍藏八大、石濤書畫精品”、“南宗北斗——董其昌誕生四百五十週年書畫特展”等大型展覽，以及由澳門館策劃組織、邀請海內外傑出華人藝術家一同參與的“以身觀身——中國行為藝術文獻展”等，凸顯澳門在過去、現在及將來一直充當着文化交流平臺的角色。藝博館希望透過這些展覽和相關活動，有助於提高澳門市民的文化藝術視野及欣賞力，為樹立澳門城市的文化藝術形象發揮作用。

遺產元素在博物館平面設計上的應用

在簡略地回顧了澳門的文物保護工作以及它背後特有的歷史狀況後，人們就不難理解澳門藝術博物館的工作方向，是在一個怎樣的社會脈絡中形成的。藝博館一直十分重視出版物的平面設計及展場佈置工作，從一開始便考慮到文化積澱的作用，在博物館展示的設計中，對遺產元素進行多維靈活的



“妙諦心傳”大型文物展之畫冊封面



“巨匠心影——畢加索版畫展”展場



2002年澳門藝術博物館展出的故宮珍藏

運用。這些圖象生產，可以建構一個新的文化再現效果。茲舉幾個在博物館平面設計上對遺產元素再利用的例子：

一、字體與圖象

中國書法藝術源遠流長，為世人所贊頌，故此文字不獨作為主要的實用性溝通符號，而且自身具有高度的審美價值。在平面設計中，與主題配合得當的字體將使作品產生令人難忘的藝術效果。在 2003 年舉行的大型文物展覽“妙諦心傳——故宮珍藏藏傳佛教文物展”中，為配合佛教藝術主題，選用了唐代僧人書法家懷素的書法作為圖象的主體之一，讓瀟灑清麗的大師書法結合製作於 18 世紀的旃檀佛像，讓人產生一種超塵脫俗的神聖感覺。而在 2002 年舉辦的“海國波瀾——清代宮廷西洋傳教士畫師繪畫流派精品展”的推廣設計中，策展者及設計師們決定集合康熙御筆書寫的“瀾”、雍正御筆的“國”及乾隆御筆的“海”“波”兩字，讓祖孫三代帝王的雄渾字迹

及其象徵意義注入圖象設計之中，引領觀眾進入中國封建社會一個燦爛輝煌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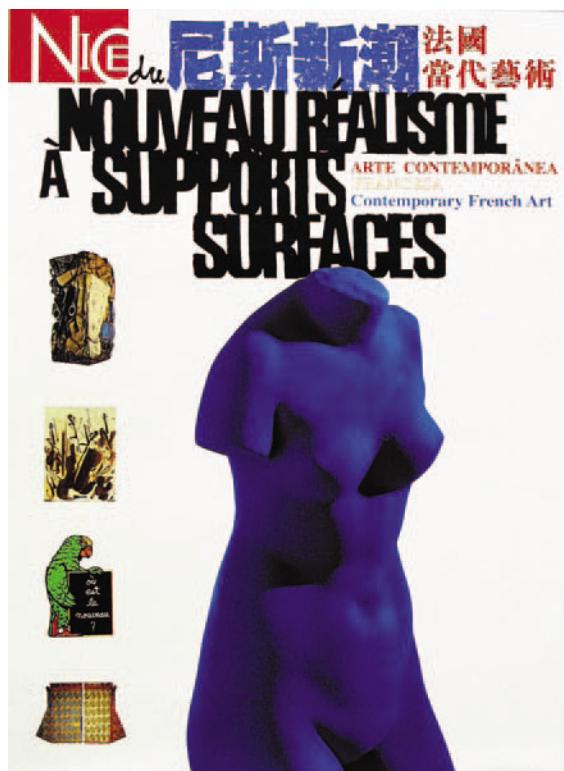
二、顏色與象徵

顏色在不同民族及文化中，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徵性意義。例如在法國國旗中藍、白、紅三色鮮艷耀目，分別象徵着法國在立法、貴族與公民三權的平等關係。然而，法國著名新現實主義藝術家克萊因（1928-1962）則認為藍色代表“獨立自主解放的精神”，1962 年他把大量的藍色塗料用於創作，使一件件藝術作品充滿令人疑惑的神秘感。之前，他更在裸體女模特兒身上沾上滿身藍色顏料，然後在畫布上留下了她們身體打滾的印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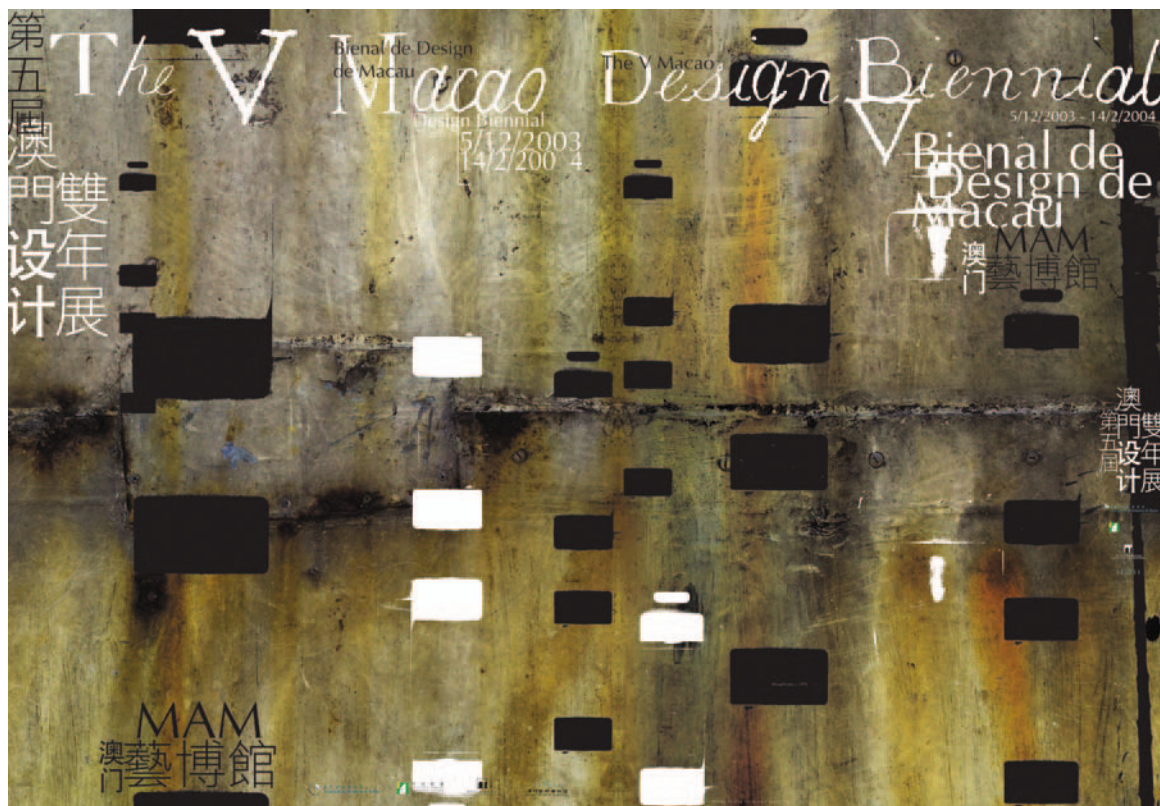
2000 年，在本館舉辦的“尼斯新潮——法國當代藝術展”中，克萊因的作品亦同時展出。我們決定以他的藍色藝術作品作為設計意象的重點，並在文字安排上配合紅、白兩色，令人聯想起法國旗幟的同時，亦感受到來自法國尼斯蔚藍海岸的藝術家那種強烈的藝術氣息。



“海國波瀾”展覽之海報設計



“尼斯新潮”展覽之推廣海報設計



“第五屆澳門設計雙年展”海報設計

三、喚起記憶

集體記憶是人們文化認同之基礎所在，而失卻記憶對於一個城市來說是難以想象的。藝博館作為“第五屆澳門設計雙年展”的主辦機構之一，在規劃活動形象時，思量着如何在這項讓兩岸四地設計師共同參與的活動中，突顯澳門作為交流平臺的角色。經藝博館策展者和設計師們商議，最後選擇了在“爛鬼樓”——一個澳門居民無人不曉的販賣各種古董、文玩、紙料、傢俱及雜貨的老街區，選擇一片經歷風吹雨打的鋅鐵板建築物殘件，作為設計圖象元素，去營造一個象徵超越時空的感性記憶空間，讓海峽兩岸及港澳設計師在其中相互接觸、交流。

同時，我們於澳門“基督教墳場”——一處安葬着英國著名畫家錢納利及首位在中國境

內編成英華字典的馬禮遜兩人的墓碑上選取了一片刻有 19 世紀的墓誌文字，將它們拓印下來，作為設計海報的標題，讓充滿記憶、純真又樸拙的外文字體再生於現代的设计作品中，散發着電腦植字無法替代的詩意般的記憶，一種濃烈的鄉土情感透過圖象設計被重新喚起和創造出來了。



澳門基督教墳場中的 18 世紀墓碑



◀ “四合一”的“妙諦心傳”海報

四、與傳統習慣結合

為了達至推廣活動擴大影響的目的，一些展示的宣傳品即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去考慮，例如藝博館在策劃“妙諦心傳”展覽的戶外推廣活動時，考慮到舉辦這項重要展覽正值新春期間，而其間不少百姓、店舖依然保留着春節張貼門神的習俗，於是便刻意選用繪畫於乾隆年間的佛教四大天王唐卡繪畫作形象，設計成既可四張合併成一體，又可兩張組合或單獨出現的一套四張海報系列。其結果是不少商戶把成雙成對的海報用作為“門神”貼於門上，這樣一方面達到裝飾商店的效果，同時亦透過市民的不自覺參與和投入，讓展覽的消息傳遍大街小巷，更使故宮珍藏的文物圖象在澳門形成了一道吸引遊人注目的風景線。

文化遺產是體現人類創造力、表現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獨特生活方式和社會變遷而有助於人類自身反省的不可多得的參照資源。澳門藝術博物館在平面設計的規劃實踐中，對設計元素的選擇及對文化遺產元素的利用，與其說是出於視覺上的考慮，不如說就是一種文化判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選擇適當的具象徵意義的



◀ 商店以澳門藝術博物館之宣傳海報當作門神



按當代博物館規格而建成的澳門藝術博物館

遺產元素，以配合突顯本地的城市文化形象，同時以視覺圖象啟動人們心中朦朧的意象和記憶，一些似曾相識的人類智慧或歷史痕跡，透過視覺媒介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四周逐漸呈現，使得文化遺產（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透過集體記憶的再創造，把人們之間及在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並與當下的生活色彩結合，營造出嶄新的文化氛圍。

【註】

- (1) 吳衛鳴，〈澳門城市文化空間今昔談〉，《創建·重新——城市中的文化空間》，在藝術空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澳門：牛房倉庫，2003年9月。
- (2) Rosaldo, Renat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r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 (3) (4) Clayton, C. H. "Discourse on the City: Identity Formation and Urban Change in Contemporary Macao",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3,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2003, p. 69.
- (5) 引自《澳門世界遺產》網頁之〈前言〉(<http://www.macaupatrimony.net/mherit/indexC.asp>)。
- (6) Durão, Luís. *Na Afirmação de Uma Identidade*.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7, p. 9.
- (7) Mayer, M. "Local politics: from administration to managemen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Regulation, Innovation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Cardiff, 13-15 September, 1989, p. 12-13.
- (8) Pereira, Francisco Gonçalves. "Towards 1999: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Macau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n R. Cremer, ed.,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Continuity and Change*, 2nd ed. Hong Kong: API press, 1991, p. 273-274.
- (9) 同註釋(3)，頁70。
- (10) 相關的研究論述，尤以80年代末起由文化司署出版的一系列《文化論叢》書籍和《文化雜誌》的內容主題最具代表性。
- (11) Clayton, C. H. "City of Museums: Reflections on Exhibiting Macao".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5,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2003, p. 122.